



高等教育产业化视角下对文凭与过度教育的反思与分析

陈 磊, 刘 夏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00)

摘 要: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高等教育产业化下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教育过度现象愈加明显,对社会各界产生深远影响,社会对文凭的要求也水涨船高。高校毕业生为谋求好职业、高收入和晋升机会等,对高文凭的追求日益火热,引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从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视角对文凭热与过度教育进行反思,政府要正确引导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高校则依据科技产业发展培养所需人才,高校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样才能避免因追求学历而产生的过度教育,让高等教育更好地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共进。

关键词:高等教育产业化;过度教育;结构性失业;终身学习

中图分类号: G64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1) 01-0016-05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1.01.003

2019年10月和11月,深圳市南山外国语高级中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分别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教师拟招聘录取公告,“中学超豪华教师名单”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成为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的话题。公告显示: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招聘6位博士、3位硕士;深圳市南山外国语高级中学招聘20人,均为硕士以上学历。两所中学拟录用人员29名,其中86.2%的来自清华与北大,剩余几位也是国内外名校。2019年全球经济维持下行趋势,国际贸易局势持续紧张,贸易增速继续低于趋势水平,中国经济前三个季度增长6%,经济发展的放缓与这些毕业于知名高校的高学历人才担任高中教师是否有一定关联,这是否为人才浪费或人们所说的教育过度呢?人们认为这种现象既会导致社会教育资源和个人人力资本的浪费,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损失和工作

满意度的下降,甚至会由于文凭贬值等引发一系列的社会连锁反应,这不禁引发教育工作者再次对过度教育的思考。在经济转型、教育扩张与知识失业的多重背景下,过度教育现象愈加普遍,对社会的影响深远。

一、关于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分析

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议的焦点在于高等教育能否产业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由国家财政单一性拨款,具有公益性事业性质。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其实质是高等教育按照企业的运行模式,把教育作为一种产品、一种可购买的消费,主要通过提高学费标准和发展民办教育等方式来刺激教育的消费和拉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提出,

收稿日期:2020-04-04

作者简介:陈磊(1981-),男,河南信阳人,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刘夏(1983-),男,四川宜宾人,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计算机应用。

对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体制以及投入体制等产生重大影响,也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主要经历三个重要时期: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91年。在我国政府确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发布,要求加强宏观管理与简政放权,确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高等教育产业化与市场化实现政策支撑;第二阶段为1992年至1999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而促成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该阶段也是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为从2000年至今。在全球化以及国家财政资助缩减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不断以市场营销的方式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本。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理论探讨走向教育实践,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高等教育办学效益不断提升,为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背景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更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实践佐证。《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也迎来我国大学的扩招,扩招后的第一年即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约107万人,2019年达到834万人,增长近7倍。过度教育是指个人接受的教育水平超过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的一种现象。如此多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就业市场,势必会导致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这正如前文所述的中学招聘中出现众多出自名校的硕博士毕业生。可以说,在我国就业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将会持续处于高位,供需的结构矛盾会依然存在,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郝龙飞采用二元逻辑斯谛回归探讨在“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就业数据的分析中指出该校毕业生群体存在明显的过度教育现象”^[1]。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过度教育势必存在,社会各界对高文凭的追求不会降温而是水涨船高。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弥补教育经费短缺、扩大内需等具有积极意义。高等教育可以产业化,但是不能完全市场化,必须要考虑高等教育的公益性特征,其终究是以育人为首要目标,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违背教育的规律和属性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重申“高等教育产业化”问题仍具有比较深远的实践意义。在高等教育产业化视角下探讨文凭与过度教育,将有利于高校教育工作者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出路。

二、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与文凭病

(一)高等教育与文凭社会

现代学校教育不仅肩负着传授知识技能的功能,还发挥着制造入场券,即毕业文凭、资格证书的功能——人才及个人收益的分配的社会功能。社会经济产业发展需要高校培养与之相适合的行业人才,但这样的发展却也引发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病症,即文凭病(Diploma Disease)。早在几十年前,Ronald Dore 在其《文凭病——教育、资格和发展》(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2]一书中就观察到这种文凭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处于极度的困境中,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努力地追求着文凭,而不是追求好的教育。Dore(1976)指出,在全球发展中的区域里,学生都为了教育文凭感到焦虑,特别是文凭构成足够的条件,让学生能够在现代的经济部门中获取工作。换句话说,学校教育变成一种竞争的场所,在学校的阶梯里如果可以爬得够高的话,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文凭价值。

高等教育文凭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1979)在其著作《文凭社会》^[3](The Credential Society)中描述,一部美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史,就是一部美国社会阶层化的演化史,美国社会在Collins看来就是一个“文凭社会”,文凭社会是教育藉由文化市场与社会阶层产生共谋关系的产物,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最佳途径。

(二)高等教育产业化与文凭热

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从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发布,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到2010年7月国家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及投资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高等教育产业化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合法性建设,一方面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型体制,保障了高等教育产业化运营;另一方面,有效地克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低效配置,推进了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民办高等教育兴起,“教育成本”概念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形成“校银合作”“校企合作”“校资合作”等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践模式,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

高校毕业生规模庞大,经济发展态势放缓,追求高文凭的热情高涨。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到2500万以上,2019届高校毕业生预计为834万人,规模庞大的毕业生规模涌向就业市场,大学生就业难常被媒体报道。为在就业市场上谋求一份高薪职业,提升学历水平是很多学生的选择。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再创新高,全国考研人数达到340万左右,比2019年增加50万人,增加15.6%^[4]。为应对就业危机,提升学历是不少毕业生的首选。因为高学历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高的收益回报。种种数字显示,对“文凭热”的追求热情日益高涨,追求高薪是很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考量之一,这显然并不是我们的教育目的。

高等教育产业化带来高等教育规模的膨胀,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让Dore(1976)感到最痛心的就是现代教育发生变质,由追求知识、真理的教育蜕变为追求学历文凭、追求收益的教育,教育水平和质量普遍下降,受教育者关心的只是为了获得证明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一张证明,进而在经济发展中谋求高薪职位,获得高经济收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未来就业报告》^[5]显示,全世界正兴起工作场所革命,人类与机器和算法协同工作的方式将对全球劳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凯恩斯认为,机器将会导致“技术性失业”,那么人工智能(AI)的应用将会取代规则性体力劳动和规则性智力劳动岗位,势必会冲击一些拥有大学文凭的毕业生失业,且对就业岗位的收入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高校毕业生会从事更低职位要求的工作,会给受教育程度低的就业者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压低工作收入。高校作为行业人才的培养基地,有责任满足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在未来能否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教育应配合产业的需求似已成定论,也是各国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与过度教育

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为社会各界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这引起世界各国竞相模仿,各国政府都无不大力地扩张和投资高等教育。普遍认为当国民的教育水平愈高时,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竞争力会相应地提升,教育似乎只是为追求经济发展,无形中教育价值也就等同于经济价值,这就是现代社会有文凭病的重要原因。工作竞争理论认为,不同工作岗位有其不同的技术、生产力要求和薪酬水平,工作行列越靠前的岗位工资越高,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也越高(杜宜敏,2015)^[6]。工作岗位数量增加的速度远低于高学历者人数扩张的速度,导致高学历者在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

时,或者选择工作行列后列的岗位或者继续深造。因此,过度教育的表征在于毕业生供过于求、毕业生经济地位下降以及持续升温的“考研热”等,势必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以及陷入“就业难——考研热”的怪圈等。

如果让每个国民都能拥有一张高等教育的文凭,就能带动产业的繁荣,创造经济奇迹,就如同美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一般,将教育力转化为生产力,将知识转化成黄金,那么,我国这几十年来不断地扩张高等教育,让每个高中毕业生都有获得大学学历机会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在培养大批产业工人的同时,也带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失衡。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当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的工资则会下降,教育成本大于教育投资回报,这将抑制教育投资,教育过度就会产生。因此,以往被视为稀缺物品的文凭并没有把获得的文凭变成高收益。高等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它为社会带来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的恶梦及其带来的一连串社会危机。由于政府过分扩张教育,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开始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受教育劳动力面临着知识性失业,或者以较高的学历选择较低阶低薪的工作,所受的较高教育形同无效。

众多学习美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国家,其扩张高等教育的目的最主要有创造经济价值,而对受教育者个体而言,就是能学以致用谋求较好的工作,提升个人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我国实施的一些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利用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拉动高等教育人口数量,这里不仅有高教资源稀释、降低高教质量问题,亦有严重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导致大量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不得不低就于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高等教育贬值,形成“学历通胀”(degree inflation),当实际教育程度超过目前工作所需具备的教育水准,也可以称为利用不足(underutilization),它不仅是人才的浪费,也是社会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其实质是以“高等教育企业化”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侧重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实现准市场化改革,以盈利为目的。二者本质上有区别,不能等同视之,在看到产业化问题上要依据不同的国情与政体来科学对待。

四、过度教育下的结构性失业大潮

(一)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

当前教育与职业的不匹配主要源于知识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供需失衡(张冰冰、沈红,2019)^[7]。

过度教育所形成的结构性失业,也称之为“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定义,结构性失业是指受过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目前,对结构性失业的具体界定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指一部分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界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或屈身做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失业问题实际上是过度教育造成的并发症,它比一般失业问题更难克服,由于学生在学校所学技能无法满足岗位工作需求,因此需要更长久时间去克服。各个国家很容易忽略结构性失业的杀伤力。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下各个行业的工人可以相互替代,没有太多技术壁垒,工种没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跨行就业难度小,工作可替代性强。当环境的变化超过学习进化的速度,其专业化程度反而成为学习障碍,或者说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增加,可塑性就降低,那么“隔行如隔山”的效应会不断极大化。现代信息化社会需要高度专业化人才,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其他专业跨界从事很难,该行业所需的学历与专业能力需要经过高校多年的专业培养才可以获得,短期的培训无法获得。针对结构性失业,以学校教育培育人才来解决,所以其所需时间很长;问题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下,各国都在透过高等教育产业化加快研发速度,产业更替速度非常快,于是经过数年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人才,无法与行业接轨而出现过度教育,致使结构性失业问题更加难解、更加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二)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及危害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推动下的过度教育将导致一系列影响,宏观特征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教育供给超过教育需求;微观特征就是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收入降低,教育投资与教育收益失衡。由于以上问题,更造成社会上的人才高消费,出现高知低就及结构性的低薪,引发结构性失业、婚育年龄延后、少子化问题加剧等各种社会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经建会”主委胡胜正指出,一个大学毕业生出社会时约二十二岁,踏出第一步如果受到重大阻碍,将影响他之后四十到六十年的人生。假如失业超过一年,社会新鲜人就必须面对新一波毕业生的挑战。事实上,几乎所有实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国家皆是如此,而且问题都日益恶化,特别在全球经济低迷下,青年失业潮如海啸一般一波波地冲击着各国的社会与政治。2019年5月韩国统计厅发布《4月就业动向》报告,2019年4月韩国就业人口同比增加17.1万人,再度跌至20万人以下;失业率为4.4%,创2000年后19年来新高。我国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产业化,大量扩张高等教育的规模,高校毕业生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到了2010年,由于扩张太

快,市场需求小于供给,开始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问题。但与此同时,却又有45%的企业找不到它所需要的人才(杜海玲,2008)^[8]。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因素,现代科技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但是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比传统行业少,高科技产业需要精兵强将而非劳动力大军,它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产值,可是对整体社会的就业率来说帮助不大。2018年12月,普华永道发布的《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9]中提到:我们预测,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高于对英国20%的估计。人工智能会对当前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干扰,数百万工人需要转换职业或转移工作地点。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2016年初便预测,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崛起,将导致全球15个主要国家在接下来5年净减510万个工作机会。在这种科技产业畸形发展中,它不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而且还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从而扭曲社会结构,造成M型社会,即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的人就沦为赤贫的失业一族。事实就如世界经济论坛所指出的,世界上最富有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全球其余人口加起来还要多。但是,普华永道也提出,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也可能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可见,结构性失业需要高等教育在配合产业经济发展中,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种类及模式以适应新科技与技术的发展。

五、结论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中美贸易战等的影响,东南沿海区际产业转移,人工智能、机器人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挑战,高等教育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改变21世纪初期的教育培养模式。在现代社会,文凭并不等于经济,获得文凭也不等于成功。文凭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驱使人们把文凭视为谋求好职业、高收入和更多晋升机会的有效途径,导致过度教育、教育寻租和文凭腐败等现象的发生,进而引发文凭信用危机。政府是文凭最权威的授予者,高校作为文凭的执行者,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品质,让学生能力与文凭相匹配,正面发挥文凭的作用。作为高校毕业生,一张文凭不能代表全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时俱进,在智能时代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数据素养和人文素养,以适应科技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因此,高等教育仍应以开发学生潜能、培养批判思考能力、促进健全社会的发展为其主要目的,而不是服务于某个特殊产业。高校与雇主和学习者共同设计课程体系,为学生打造个性化量身定制的教育服务,把终身学习作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另

一种途径,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过度教育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 [1] 郝龙飞.学历层次、本科毕业院校与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J].山东高等教育,2019,(5):47-55.
- [2] Ronald Dore.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3]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4] 中国考研网.2020年全国各省市考研报名人数汇总

[EB/OL]. <http://www.chinakaoyan.com/info/article/id/315257.shtml>,2019-11-18.

- [5] 世界经济论坛.2018未来就业报告[R].2018-09-30.
- [6] 杜宜敏.对经济学视角下过度教育的反思与分析[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2):4-7.
- [7] 张冰冰,沈红.中国过度教育的理论验证[J].复旦教育论坛,2019,(2):62-69.
- [8] 杜海玲.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8,(14):219-220.
- [9] 普华永道.人工智能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R].2018-12-21.

[责任编辑:陶济东]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on Diploma and Over-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EN Lei, LIU Xia

(Sanya Aviation & Tourism College, Sanya, 572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scale of educa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phenomenon of over-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society's requirements for diplomas have risen. In order to pursue good career, high income,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college graduates are increasingly pursuing higher diplomas, which has cause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We must reflect on the diploma fever and over-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correct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train the required talen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college graduates must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void over-education due to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so that higher education can better coordinate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ver-educatio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lifelong learning